

結 論

本文透過與祖源觀念相關的四個面向：(一) 族群分類、(二) 神話圈、(三) 象徵物、(四) Lmuhuw 傳述方式，來進行闡述。將自稱及自我認同為 Tayal 者之 emic 觀點予以呈現，並由其內部對於祖源觀念的相關爭議，來談當代 Tayal 歷史記憶的建構。

(一) 族群分類

透過回顧百年來學術界與官方對於「泰雅族」的分類與認定方式，可以看出兩者均以 etic 客位研究呈現出外部觀點，而非 emic 主位參與的方式呈現內部觀點。也因此誠然「泰雅族」之名稱，其由來係源於語言自稱及我群認同為 Tayal 者，但其實際指涉及涵蓋之對象則深受分類者之分類標準所影響。本文以有別於過去文字紀錄的外部觀點，而以 Tayal 由其自身語言使用與從中所傳遞之訊息所發展出來的自稱與認同及對系統源流或地域群之辨識，其認知之建構與傳播媒介，是以語言為主要基礎。因此筆者提出了「2006 年泰雅族分佈現況、系統分類暨行政區對照表」試圖建立以部落為單位，進而上溯地域群及系統所屬乃至 Tayal 族名之一個由下往上的分類方式。而以此種內部觀點，重新看待「泰雅族」的自我辨識，就可以從此理解其族群歷史建構的基礎，並作為民族自我表達的體現。

(二) 神話圈

移川子之藏於 1935 年《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一書中針對自稱為 Tayal 者之書寫，提出了以神話圈 (Pinsbkan/Papak wa'a) 對應於方言系統 (Squliq/S'uli) 及地域群的分類概念，並且以為 lkmButa、lkmYaboh 兩位人物實為 Pinsbkan 神話圈所共同認知之始祖代表人物。唯筆者於近年來對其所分類 Papak wa'a 神話圈之田野調查中，亦發現了關於 lkmButa 之相關報導，究其因則與部落人群及其所使用之語言受到自願或非自願性 (例如戰禍、集團移住) 的遷徙與流動有關。也因此透過語言所傳佈的神話傳說及其相關之歷史記憶，深受語言使用人口、分佈區域及語言勢力之消長所影響。以目前 Tayal 社會各方言群所面臨族語傳承之危機來看，Squliq 方言系統者無論於分佈區域及人口數皆居於相對多數且其內部之歧異性較低，因此其語言得到較多之紀錄 (諸如基督教會 Tayal 語聖經翻譯即採用該方言，而目前學校教育所推行之族語教學其教材之編寫及數量，亦以該方言系統者居多)，因此 Squliq 方言系統其對於當代 Tayal 民族之歷史記憶建構，實居於主導地位。

(三) 象徵物

以目前 Pinsbkan 神話起源地周遭部落對於神話起源地點確切位置之差異表述可發現其係立基於當代各報導人之不同生命經驗及其知識來源之差異。認為 Pinsbkan 係位於 rgyax Tukan 者其知識來源之媒介為其族語，而認為 Pinsbkan 係位於 b'nux Sbayan 者之媒介則為族語或引日治時期以來透過文字書寫而成的文獻來做依據。有鑒於目前族語式微及報導人凋零的狀況來說，倘若透過族語傳播之差異論述來得到紀錄及保全，有朝一日 Tayal 對於祖

源歷史之建構，恐怕僅存目前文獻所記載者之一元說而使多元豐富的口傳歷史記憶產生定著與固化。

（四）Lmuhuw 敘事方式

Lmuhuw 這種透過語言傳講或吟唱之敘事表現方式，實為 Tayal 語言之精髓所在，而 Msgamil（尋根、溯源）歌謠此一對於祖源觀念的傳述模式，是昔日 Tayal 歷史記憶建構的核心，隨著此一傳述模式的式微，其所突顯的似乎是語言及由其所建構之歷史記憶的消亡，因此對於當代 Tayal 關於祖源觀念之歷史記憶建構所面臨最迫切的傳承危機，其所需的緊急措施似乎在於搶救目前殘存於 Tayal 分佈各地區所傳唱之 Msgamil 歌謠，透過科學版本的紀錄方式來保存及拼湊歷史記憶，而這樣的紀錄方式不僅使後人對於該段歷史記憶的詮釋有原始資料的脈絡可循，而書面文字化後的語料亦可以提供未來作為族語復振的珍貴素材。

田野調查一直是民族學知識建構的方法基礎，而民族誌則是田野的具體成果，而民族誌在瞭解異文化的目的上實有良窳深淺之差，這些差別奠定於田野工作者能否將其特有的民族誌再現與豐富的社會、文化與歷史知識連結，這更是來自民族學研究的實踐（包括研究者的理論知識與觀點、比較民族誌經驗、田野工作的累積成果等共同構成上）。本研究採用的民族誌材料乃是立基於 Tayal 語的基礎，在論文的書寫上對於訪談的內容則以漢譯的方式呈現，遇有關鍵字則加註原語之羅馬拼音，此外對於重要之語料則以科學版本來記錄，這是本論文最大之特色所在。之所以會大量採用語料的用意，在於透過語料讓 emic 發聲，對於非出身 Tayal 本族人的研究者來說，這是需要長期經營始有辦法貼近的，而其關鍵實在於對研究對象的語言文化熟悉與否。言說行動是稍縱即逝的，語料乃不斷在變動中。本論文提供過往 etic 研究文本與當代由 emic 口語敘述所建立的文本一個對話的平台，而其中所突顯出語料之重要性，亦提醒著筆者未來對於本論文之延伸發展尚須結合語言學、歷史學、民族音樂學…等跨學科知識的整合來進行討論，才能使本研究更臻完備。

誠如孫大川於《語言的死亡》一書之序言中提到：人類語言的結構，是人類智能成就的証言，反應一個族群的性格與文化特色。因而語言便是民族的族譜，是自我身份認同的線索；喪失自己民族的聲音，猶若失去民族靈魂的安宅，死去的不只是語言，民族與文化也隨之死亡了¹。現代的台灣是一個由多民族所組成的國家，而每一個存在於台灣的民族，都為台灣提供了某種文化模式，而此種模式也是我們了解台灣的一種視角。這塊土地若有二、三十種描述本土的方式，將使台灣的內涵更豐饒。所以無論族群的大或小，均應享有公義、平等的對待與尊重，懷抱盼望與理想，攜手建立民族共榮的新台灣。

¹ 參見大衛·克里斯托著，周蔚譯，2001《語言的死亡》，台北：貓頭鷹出版社，頁 22。